

##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 ——杨庆堃先生的学术人生

○ 孙庆忠

( 中国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083)

**〔摘要〕**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C. K. Yang)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其学术洞察与思想创见不仅给后续性的研究带来了理论滋养和灵感,也彰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价值。本文以杨先生从求学到治学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在历史钩沉中重温了他对中国社会学重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杨庆堃;社会学;中国社会;中国现代化

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C. K. Yang)一生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20世纪三十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系统的调查,可谓集市系统理论的雏形;四五十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承袭了燕京学派的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以民族志的方式见证了转型时期的中国乡土社会,诠释了共产主义革命对传统家庭制度的冲击和影响;六十年代对宗教的现代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对中国是否有经济城市的检验,以及对十九世纪社会运动的历史考察,均彰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价值;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对中国社会学重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其探寻中国社会发展之路的努力,也是其治学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燕京求学与岭南旧事

杨庆堃祖籍广东南海,1911年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富商家庭。虽为富家之

---

作者简介: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子,却不愿子承父业。他的生活世界使他目睹了英国殖民者的傲慢自大和深受剥削的中国人的贫困潦倒。因此,在他的一生中,中国以及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深入他的骨髓。1928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报考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在燕大求学期间,他与同窗费孝通结成了终身的友谊。1932年9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领袖罗伯特·派克(Robert E. Park)受燕大社会学系聘请来华讲学,将当时世界最新的社会学思想带到了未名湖畔。杨庆堃深受其思想润泽,并以《派克论都市社会及其研究方法》(1933)一文<sup>(1)</sup>阐释了他对都市社会问题的理解。可以说,派克的学术思想是他下决心前往美国学习的精神动力,也是他一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1939年,在获得密执安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杨庆堃曾在纽约商报担任编辑。这种选择一方面源于他对服务同胞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是深受派克生平阅历的影响,这位大师便是在几个大城市做了11年记者工作之后才从事学术研究的。在这一时期,反对美国的暴力行为,为争取华人社区的利益而战是杨庆堃的主要工作。自1944年起,他在华盛顿大学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也正式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这一年,他的著作《华北地方市场经济》<sup>(2)</sup>面世。将市集对农村社会的功能作为探索的主题,缘起于1931年夏他跟随杨开道教授到山东邹平进行的农村社会观察。1932年,在来燕京大学讲学的派克教授的鼓励下,这一研究得以在人文区位学的理论视角下延续。1933年3月中旬,他再次到邹平仍以城关集以及附近的明家集和刘聚桥集作中心,花了六个星期的工夫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基于此,他将邹平的市场系统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三种基本类型,并从贸易区域、内部组织、交通运输、集期安排与商人流动等多侧面,描述了以赶集为乡村经济生活模式的市场圈。这项研究填补了对中国本土经济领域认识中的一项空白,也为西方学者学习中国乡村生活知识提供了一个丰富而重要的来源。

1948年8月,杨庆堃应邀从美国回到广州私立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所在地)任社会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为了延续该系“认识社会实际”这一教学传统,他力主建立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在对学校附近七个村子历时一个月的观察后,杨庆堃决意在鹭江村设立研究站,实行“社区研究”计划。1949年秋季开学前,广州即将解放。杨先生强调“不管局势如何变化,调查必须设法坚持下去,农民夜校和医疗站也要继续办下去。”<sup>(3)</sup>1950年夏天,岭南大学掀起了反帝仇美运动的高潮,校园里的美籍教授和美籍华人都十分恐慌。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春节前被调到北京翻译毛选工作的杨庆堃回到广州,并与夫人和两个出生在美国的孩子悄然从香港返回美国,由他主持的鹭江村调查宣告终结。尽管如此,他在实地调查中所坚持的信念,不仅为他的几部重要著作搜集到了不可重现的资料,也兑现了社会学关注和阐释社会变革的承诺。

## 二、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

1952年,杨庆堃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研究中心。1953年,他在

匹兹堡大学担任社会学副教授,并于1958年晋升为教授。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杨庆堃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sup>(4)</sup>是杨先生在岭南大学任教期间根据对近郊乡村社区调查完成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全面而细致地记录了这个城市边缘乡村社区的文化形貌,内容涉及人口结构、土地利用、生产消费、亲属制度、权力结构、阶级的稳定性和流动性以及新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乡村经济与文化娱乐的变迁。《婚姻法》为乡村社会带来的“家庭革命”等诸多方面。杨著的重要价值在于,描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前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模式和之后锐变中的乡村生活,再现了共产党执政前后历史性的变迁过程。时至今日,这一著作仍然是从村落的微观视角,展示社会剧变的一部精当的民族志报告。在与中国大陆断绝联系长达三十年的西方世界里,一直是学者们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文献。

与村落社区的研究相互印证,《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sup>(5)</sup>则集中展现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改变了家庭结构,又是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念以及家庭成员的内部行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生产和消费是其首要功能。家庭还是一个提供教育、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组织。此外,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宗教组织,祭祖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具有维系道德和保持认同的功能。由此可见,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传统社会中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宗教制度赖以依存的核心。因此,家庭制度的变革始终是关注传统社会如何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杨庆堃对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家庭的研究是最具影响力的探讨共产主义中国的婚姻和家庭的著作,他的结论还掀起了20世纪八十年代初学者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二次热潮。

在杨庆堃的研究中,《中国社会中的宗教》<sup>(6)</sup>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被西方学者视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在此之前,中国是否存在宗教,宗教在民间社会的存在形态是否可以视为宗教,是始终没有定论的。杨先生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正是缘起于他对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地位问题的思考。他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发挥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与存在的基础,而这些功能又是通过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其目的是对一些重要的事实做出功能性解释,以便展示宗教和社会秩序的关系模式。为此,他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论来解析中国社会,受其特殊(Specificity)和发散(Difference)的概念启发,将宗教分成两种结构形态: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与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制度性宗教自身拥有神学或宇宙和人事的解释系统;拥有独特的象征和崇拜仪式;并且有一个独立的人事组织去促成神学观点的阐释和祭祀活动的进行。从结构的角度而言,制度性宗教的最大特点是可以独立于世俗的社会体系之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分离。分散性宗教也有其神学、祭祀与人事的运作系统,但无论其精神内核还是形式化的仪轨组织,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总之,制度性宗教作为分离出来的世俗宗教系统,其自身独立地发挥作

用,而分散性宗教则只能依托世俗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其功能。因此,前者在基层社会组织中的渗透力及示范意义,相对于后者而言是微弱的;后者则几乎无法以独立于社会基层网络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是作为社会秩序的支撑力量运作于世俗生活之中。杨先生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关注点是从清代至新中国初期,特别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现代变迁时期的中国社会。就此而言,他对宗教和社会秩序之间关系模式的阐释,与其对村落与家庭的研究在终极关怀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深度地理解中国社会。

1962年,杨先生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研究自17世纪以来广东佛山镇的发展,其内在的学术思路他曾如是表述“1962年开始,我以佛山镇为个案,进行了一项关于传统的中国城市及其现代变迁的研究。这是我访问日本、台湾、香港和东南亚收集资料的后续。……这项研究工作对于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社会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然而,由于研究资料的匮乏,使得这一领域的学者很难做出系统的研究。据我所知,我的尝试是开创性的。”“此外,除了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这项研究还在比较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对此,韦伯(M. Weber)曾提出一个被西方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他认为,引导工业文明发展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是欧洲独有的,世界上其它地方,城市只是行政中心,在经济生产方面只发挥有限的作用。我的研究试图证明相反的观点:作为许多城市类型中的一种,经济生产中心早就存在于中华文明之中;工业化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缺失的原因,也是韦伯的观点所难以解释的。”<sup>(7)</sup>由此可知,佛山镇研究蕴涵两个基本的学术诉求:其一,再现传统中国城市及其现代变迁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增进对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了解;其二,检验中国是否有经济城市,以此来回应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只有行政中心的政府都会,而没有欧洲经济城市的论断。这项回归历史的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城市早期资本主义下的运作形态以及经济城市的特色是大有裨益的。

1964年,杨庆堃离开匹兹堡大学到夏威夷大学任教。这期间,他设计了一个涉及中国、日本和美国的颇具雄心的人才合作计划,以期使夏威夷大学和匹兹堡大学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事与日本、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建立联系,进行合作研究。六十年代中后期,为了协助香港中文大学发展社会学专业,他一方面送香港的学生到美国进修学习,以便培养教学和研究人才;另一方面安排美国教授到香港任教,以协助课程改革、提高学生素质和推动实地研究。在他的精心策划下,李沛良、刘创楚等年轻学子先后在匹兹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回校任教,成为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毕高城(Morris Berkowitz)、霍尔兹纳(Burkart Holzner)与涅尼瓦萨(Jiri Nehnevajsa)三位教授分别在1968至1971三个学年度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担任系主任,并于1969年创立了社会研究中心。1971至1972年度又请波士顿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陈郁立教授及其夫人沈爱丽教授来到社会学系任教。这种“送出去”、“请进来”的战略部署,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在七十年代迅速成长。这一时

期,杨先生创造性的工作成绩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致力于香港中文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合作项目,以匹兹堡大学为基地,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和第一代社会学家的培养立下了汗马功劳。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为表彰其杰出贡献,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第二,1965年筹划的“中国社会运动”研究计划,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在合作研究中建立了大洋两岸学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三,1968年回到匹兹堡大学后,对匹兹堡大学的国际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所积极倡导的对亚洲文化的重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就,都对匹兹堡大学的国际化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1年,杨先生被邀请到中国,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家中到访新中国的第一人。此行对他本人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中美关系缓和的标志性事件。他曾在1972年初的日常活动备忘录中写到“当我意外地收到1971年10月访问中国的邀请时,所有被摒弃了的努力似乎到达了终点。为此我将所有正在做的事情放在其后。我的中国之行安排在1971年的10月至11月。其结果未知但充满期待:不计其数的演讲、大量的媒体交流、咨询以及出版商的约稿。从11月份到现在,我在匹兹堡几乎没有停留在家里的时间。对于未来的发展仍然是一个猜测,但是对于我为存在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现实中国,为共和制度下的美国,为国内1000多个班级的学生继续学习中文,所做出的努力的重要性现在毋庸置疑。在这个时代里,阐明和传达一个拥有众多人口、广阔地域和高度政治战略意义的中国形象,其重大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许多我正在关注并从事的工作。”<sup>(8)</sup>这是他阔别故土20年后的归乡之旅。作为中美建交之后第一批被邀请到中国的代表之一,此行经香港进入国门,从广州飞赴杭州,而后乘火车到上海、苏州、南京、北京等地,最后再飞回广州。沿途所到之处,均用相机记录怀乡旅人之所见,既反映了中国社会深刻的变迁图景,也尽显了杨先生对父母之邦的眷恋之深情。他的中国之行增进了美国民众对封闭大陆的了解,也激发了他试图解释中国社会变化的强烈愿望。

### 三、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海外支撑

1979年,与改革开放同步,费孝通先生授命重建中断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此时,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新一代的社会学者。在教师和教材匮乏的困境之下,杨先生在美国积极筹措,调动资金和师资,在国外与费先生携手重建中国社会学。同年3月15日,在给刘创楚的信中说,他最近全部时间用于布置费先生访美及协助中国社会学事宜。“费现在负此全责,然三十年来老一辈社会学家尽调他职,而社会学取消之后,学校不能讲授,故无新一代的继承人。要重新建立社会学,乃无师资可用。一部分工作可用洋人,但不能全赖客卿。社会学有文化背景,且外人服务心肠,人各有异。我于是想你们一支人马,应义不容辞地回去效力。我已写信费先生介绍(中文大学)社研人物,望时机成熟时,他会和你们通讯。自然,你们之中有些或不愿或不便到大陆去,这我都很明白。

但有心回去服务的,可能不久就有这机会。我正做铺路工作,很艰苦,成败无把握。但望有成之日,我们可各尽所长,为故邦效力。”<sup>(9)</sup>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杨庆堃教授和匹兹堡大学校长 Wesley W. Posvar,以及社会学家霍尔兹纳与涅尼瓦萨到北京访问,并围绕“现代化与社会学”做了系列的演讲。此行受到了姚依林和方毅等当时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一个里程碑,并使人才培养计划有了一个准确的时间表。社科院决定,于1980年夏在北京举办首届社会学讲习班,成员大约50名,由各省调派。讲习班以“现代化所需之社会学”为主题,介绍基本概念、研究工具及各国经验。在筹办讲习班的过程中,杨先生在海外与费先生合作,取得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并邀请多位美国社会学者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到北京讲课。为了“使学习干部能各回本单位用其所学,作些客观的科学调查研究”,杨先生在与李沛良和刘创楚二位教授的书信往来中,对课程大纲、讲授内容和参考书籍等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1981年夏在第二届社会学讲习班期间,他还亲自为学员讲授“社区研究”专题。他对中国社会学事业所倾注之心力由此可见一斑。事实证明,1980和1981年在北京举办的两期讲习班与1982年的武汉讲习班一起,为中国社会学“恢复其冬眠30年之生命力”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在积极协助费孝通先生筹办北京讲习班的同时,杨先生又协助当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何肇发教授建立社会学系,并取得美国岭南基金会的资助。在1981年3月27日发给李沛良的信中说“1982年6、7月中山大学计划举办暑期社会学学习班,为造就师资建立社会系做准备。办法一如去年北京的暑训班。主要科目仍为概论、初级统计。你是北京一幕的成功主角,能否请来中山再演一次,为乡梓建立社会学出力。”<sup>(10)</sup>正是在杨先生的亲自规划下,复办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确立了以社区研究为方向的整套课程设计。复办招生后的最初几年,他每年都从美国回到中大校园指导办学工作,亲自为第一批研究生系统地讲授“社区研究”课程,指导学生学位论文,参加他们的论文答辩。为了能办好中大社会学系,杨庆堃促成了岭南基金从资助中山大学的款项中,每年指定一定数额的专款供社会学系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之用。在积极参与中大社会学系重建的过程中,杨先生利用他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声望不仅引荐了匹兹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多位社会学者前来授课讲学,还为社会学系的师资建设精心谋划,利用岭南基金的资助派送青年教师出国留学,安排中年骨干教师轮流到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访学。而今,社会学已经在30年的蓬勃发展中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饮水思源,杨庆堃“造就一群社会学专业人力,为中国的需要服务”的心力,是令后辈学人永志难忘的。

1981年4月30日,杨庆堃从匹兹堡大学退休,却没有离开他所积极投身的事业,直至1999年1月9日逝世。作为一名具有国际视野的社会学家,他曾访问过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他也因此把这种经历视为社会学自我教育的过程。他用国际性的理念理解社会学

这门学科,但是他所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学的重建和尽显其学术成就的中国社会研究。他荣退之后,在给各大学作报告时总要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胸怀。作为一名身居海外的华人,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何肇发教授曾这样描述他与杨先生 1994 年最后一面的情景:谈及半世纪前的往事,从胡风反革命事件,到肃反、四清、“文革”,而至拨乱反正、“六四事件”,从毛主席到周恩来,以至朱镕基,无一事无一人杨老不了如指掌,回头一看他的藏书及报纸杂志,称得上堆积如山,……报纸杂志“左”“中”“右”都有,有新华月报,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文汇,也有台湾的中央日报、联合报,……他说看“右”的才能知道得更全面,又说看报纸要有个主轴,主轴是北京,紧紧掌握这个主轴便不会偏离方向。<sup>(11)</sup>

在重建社会学之初杨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建立社会学是十分重要的。西方社会学代表西方社会实际的概括,其研究成果中的概念以至方法,不一定适于中国实际;而要正确地使社会学建立为适合中国所需的学科,则其理论方法只能在中国实际中通过实地考察来建立。”<sup>(12)</sup>这种学术主张的深意是:中国社会学作为世界社会学的一部分,不仅要通过知识建构和现实面向展示独特的中国,还要在全球化时代汲取有造诣的社会学知识。这是他对中国社会学前路的热切期待,也是他一生关注中国社会,并以活生生的经验研究提升学术品质的关怀所在。

#### 注释:

(1) 杨庆堃《派克论都市社会及其研究方法》,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Yang C. K., *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4.

(3) 刘耀全《岭大社会学系主任杨庆堃在鹭江村搞的社会调查》,《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广州:政协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4年,第147页。

(4) Yang C. K.,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 I. T Press, 1959.

(5) Yang C. K.,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 I. T Press, 1959.

(6) Yang C. 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7) [8] 转引自 Burkart Holzner. C. K. Yang: *Sociology in the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 Wenfang Tang and Burkart Holzner (e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p. 26, 21.

(9) 刘创楚《中国社会学的新里程》,《我与中国社会学 20 年——中国社会学第一期讲习班回顾》,沈阳:沈阳出版社,2000年,第16-17页。

(10) 李沛良《廿载情缘》,《我与中国社会学 20 年——中国社会学第一期讲习班回顾》,沈阳:沈阳出版社,2000年,第10-11页。

(11) 何肇发《何肇发文集》,香港:荣誉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12) 徐展华《对尊敬的杨庆堃教授的追思》,《纪念社会学家杨庆堃教授》,广州:岭南大学校友会,《岭南校友》专刊,2005年,第139页。

(责任编辑:公乙)